

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力

余建华 王震

摘 要：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有关各方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的一场部族冲突，达尔富尔危机不能归罪于中国。中国政府从未回避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国际责任。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已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达尔富尔危机既是对中国非洲外交的一场考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对非外交的转型。

关键词：达尔富尔问题；中苏（丹）关系；国际责任

作者简介：余建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王震，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实习员（上海 200020）。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8) 02 - 0011 - 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以来，一股借苏丹达尔富尔（Darfur）问题诋毁中国的浊流开始在国际社会涌动，一些人甚至别有用心地据此煽动“抵制北京奥运会”。本文拟就达尔富尔问题的形成、它为何与中国北京奥运会发生联系、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积极姿态等进行深入探讨。

一、达尔富尔危机的起源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紧邻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占苏丹总面积的1/5，1917年归入苏丹版图。达尔富尔北部和西部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南延伸地带，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8%；中部为达尔富尔高原台地和山地；南部则多为河谷地形。该地区的气候自北向南呈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量自北向南逐渐递增，北部沙漠地带终年高温、干旱、少雨，中部山区的年降水量为100~300毫米，南部地区雨量相对充沛，年降水量约为400~800毫米。这种地理状况和气候特征导致达尔富尔地区的水土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达尔富尔地区总人口约为600万，富尔人（Fur）是80多个部落群体中最主要的族体，因而该地区以达尔富尔命名。^①达尔富尔北部的阿拉伯人主要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中部和南部的黑人土著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历史上，阿拉伯牧民和农耕土著黑人相互通婚、融洽相处，部落群体的区分并不明显。即使各部落间因争夺水源或土地偶有冲突，但大体上相安无事。20世纪初他们还共同抗击过英国殖民者的侵略。

^① “Dar”，阿拉伯语，“领地、家园”之意，“Darfur”意为“富尔人的家园”。

近 30 多年来苏丹的降水量一直很低，1998 年以来的连年旱灾使达尔富尔北部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加剧，中南部地区的丰富水资源陷入枯竭、良田大幅度退化。北部阿拉伯游牧部落为生计所迫，源源不断地迁至达尔富尔中南部寻找草场和水源，定居黑人农民为守护“自己的”土地而坚决抵抗，他们开始圈地并拒绝牧民进入。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定居与游牧部落间冲突明显增多，尤其是土著黑人农民与阿拉伯游牧部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水资源争斗不断。1990 年，苏丹巴希尔政府和地方部落首领对冲突进行了调解，但紧张状态在随后几年依然存在，一些富尔人对巴希尔政府的憎恨不断加剧。

为在冲突中获胜，双方的一些大部落开始建立自己的民兵武装。2000 年以来，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武装矛头直指苏丹政府，指责忽视达尔富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片面强调国家的阿拉伯属性，牺牲黑人部落的利益以袒护阿拉伯部落。黑人武装在与阿拉伯人以及政府军的武装冲突中日渐发展壮大，形成了两个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 SLM）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简称 JEM），前者以富尔人为主体的，后者以扎加瓦人为主体的。这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袭击地方政府官员、议会和警局，并要求实行地区自治。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社会动荡，达尔富尔问题由此形成。2003 年 2 月，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被黑人武装攻陷，政府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被俘，达尔富尔危机正式爆发。随后苏丹解放运动、正义与公平运动等黑人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以及阿拉伯民兵武装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国际社会的多次努力均无果而终。连年的内战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许多人沦为难民。苏丹政府 2004 年 9 月公布 5000 人死亡，后又称约 1 万人死亡、约 100 万人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曾估计约 7 万人死亡；而西方媒体常报道有 20 万人死亡、约 250 万人沦为难民。^[1]据联合国统计，截至 2007 年 1 月，达尔富尔三个地区流离失所者总人数已超过 200 万。^[2]虽因各种因素统计数据不一，但达尔富尔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达尔富尔危机不能归罪于中国

达尔富尔危机一开始并不为外界所关注。2004 年恰逢卢旺达种族屠杀十周年，为警示世人、避免悲剧重演，国际社会举办了系列图片展览和报告活动。2004 年又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力欲连任的布什总统一方面为转移媒体对伊拉克乱局的关注及对其政府的相关指责，另一方面也为高举道义大旗、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在卢旺达人道危机中的无所作为形成对比，从而更多地争取国内黑人和基督徒的选票，不失时机地对达尔富尔危机表现出异常的“关切”。尽管联合国、非盟、欧盟等均不认可用“种族屠杀”来给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但 2004 年 7 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状况定义为“种族大屠杀”。随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总统布什在一系列讲话中频频使用“种族大屠杀”一词。达尔富尔悲剧虽有严重性，但确因这些政治因素而使达尔富尔问题开始被“无限放大”^[3]。达尔富尔问题不仅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中国也受到无端指责，甚至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2007 年 3 月初，日本右翼政客、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声称要“抵制北京奥运会”。3 月 21 日，法国民盟主席、总统候选人贝鲁在一次集会上突然放言，如果中国拒绝向苏丹

政府施压以尽快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话，“那么法国应该不参加(北京)奥运会。”^[4]此后一些国际势力(包括相当一批对中国的非洲政策不太了解或有误解的人们)“热心”地掀起一阵把达尔富尔问题与“抵制北京奥运会”相联系的鼓噪。3月28日,美国一女演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应对达尔富尔问题负责,并号召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甚至对设计奥运仪式的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进行奚落和讽刺。4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负责人大卫·斯切弗的来信,号召抵制北京奥运,声称只有当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会给北京奥运带来损失的时候,“达尔富尔残杀才会变得重要起来,北京才会真正地对喀土穆施加压力。”^[5]5月初,108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函胡锦涛主席,警告中国如不对达尔富尔的混乱局面采取措施,将对北京奥运会有不利影响。6月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涉华决议案,继续无端指责中国与苏丹开展合作,并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钩。这些人的理由很简单: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在苏丹的石油利益,没有对苏丹政府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因此中国是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绊脚石”^[6]。

达尔富尔问题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当地长期的部族矛盾和利益冲突分不开的,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问题,这些矛盾和冲突是由苏丹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民生存竞争所引发的。因此,达尔富尔危机不能归罪于中国,中国也没有回避对这一地区冲突所承担的“国际责任”。那些试图把达尔富尔问题同中苏(丹)关系挂钩的言论是对中苏(丹)关系的曲解,原因如下:首先,中国和苏丹之间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合作共赢关系。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阿吉普公司和英荷壳牌公司就进入达尔富尔勘探石油,但未能有实质性发现。七十年代美国谢夫隆公司在苏丹南部进行了长达10多年勘探后发现产油量不甚理想,最后在八十年代末离开。苏丹多年来缺乏石油开发资金与技术,石油消费依靠进口,支出占其外汇收入近30%,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正是在中国石油公司的帮助下,苏丹从1999年起开始由石油进口国变成石油出口国。2000年起,苏丹财政首次出现赢余,苏丹巴希尔总统由衷称赞道:“苏丹工业的开创,作出贡献最大的是中国,干得最出色的是中石油!”苏丹的经济增长与中苏之间的经贸合作也是分不开的,廉价的中国小商品符合当地大多数民众的消费水平,深受他们的喜爱。世界银行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非洲的第二次机会”,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从1999年至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率为48%;其次,中国和苏丹之间的经贸合作往来有助于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中国在苏丹开发能源和矿业不仅增加了当地政府的税收,而且为当地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中资企业还帮助培训当地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为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储备。中苏能源合作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10万人次。在石油合作公司甲方单位中,中方人员仅占10%,而苏方多达90%;在乙方单位中,苏方人员所占比率也高达65%。此外,中国公司还在当地修建公路、医院和供水等配套设施,使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以中石油为例,“截至2006年底,中石油先后在苏丹投入3287万美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当地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万。”^[7]2007年初,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时要求驻非中资企业要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与当地社会和谐相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多做有利于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帮助非洲人民改善生活的好事,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8]

三、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积极努力

在达尔富尔危机面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回避作为一个大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始终坚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多次表示愿为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政府认为，制裁和冲突在任何时候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任何事关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不利于维护苏丹的国家统一，势必在苏丹全国民族和解进程中横生枝节，也势必引发地区矛盾如推倒多米诺骨牌般进一步复杂化导致动乱加剧。同理，如果不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通过求同存异获得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也断然无法根治由利益差异产生的矛盾。”^[9]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达尔富尔问题通过的1556和1564号两项决议中含有威胁对苏丹进行制裁的内容，中国投了弃权票。2006年8月，考虑到通过决议的时机不当，“无助于阻止当地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对安理会1706号决议投了弃权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视而不见或坐视不管，实际上中方支持在解决这一热点问题过程中的国际合作，赞赏苏丹政府、非盟、东盟、联合国以及有关国家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做出的努力，中国也在为推动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而积极努力。总体而言，中国的努力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同有关各方进行沟通与对话，推动缩小分歧，达成共识。自达尔富尔危机爆发以来，中方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互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发挥联合国作用等方式进行协调与沟通，推动有关各方缩小分歧。2006年1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联合国分三个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提供支援的计划，为和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其主要内容为：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21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200名军官、警官和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将由1.7万名军人和3000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掌握在联合国手中。苏丹政府对“安南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反政府武装是导致达尔富尔地区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达尔富尔问题属于苏丹内政，反对将其国际化。正是由于中国的积极斡旋，苏丹才原则上接受安南提出的方案并表示愿在此问题上进一步灵活处理。2007年6月12日，苏丹宣布无条件全面接受“安南计划”第三阶段方案。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69号决议，决定向苏丹派遣2.6万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翌日，苏丹政府宣布接受此项决议。中国在促成安南三阶段方案实施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得到了其他有关各方的公认和赞赏。

第二，积极与苏丹政府沟通，多次派遣特使赴达尔富尔访问考察。2006年1月，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吕国增访问达尔富尔地区。2007年4月，中国政府特使翟隽对苏丹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见了翟隽。翟隽还访问了达尔富尔地区，会见了北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的州长及其他官员，并参观了3个难民营，与当地各界代表和难民进行了座谈，实地了解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和安全状况。5月10日，中国政府任命刘贵今大使为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并宣布其近期工作重点将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5月19~23日，刘贵今大使访问了苏丹，他广泛接触了苏丹政府高层，并到达尔富尔难民营实地考察。6月13~24日，刘贵今大使访问了南非、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等非洲四

国及非盟、阿盟总部，随后出席巴黎达尔富尔问题国际会议，与有关方全面深入地进行沟通与协商，阐述中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和所发挥的作用，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积极提出建设性倡议，确保有关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2006年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前来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苏丹总统巴希尔时表示，中方赞赏和支持苏丹实现南北和平，愿继续为达尔富尔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作出贡献。11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中也表示欢迎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取得积极进展，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对话，在兼顾各方关切的基础上，早日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以实现达尔富尔地区和平稳定。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明确提出了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四项原则：一、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三、非盟、联合国等应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四、促进地区局势稳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显然，中国政府坚持苏丹政府的主权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尊重《联合国宪章》及人道主义的原则下推动达尔富尔问题解决的立场，并将之贯穿于整个外交实践当中。

第四，高度重视达尔富尔地区的难民生活状况和人道主义危机，努力帮助达尔富尔地区人民改善生活条件。中国政府已先后向当地和非盟特派团提供了约8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和捐款，第五批援助物资已于2007年11月抵达。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期间宣布再次向苏丹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中国还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向苏丹派驻315人的工兵维和部队，参与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任务，首批135名中国维和人员也已于2007年11月底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这支先遣分队隶属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分为指挥组、水源勘测组、道路桥梁分队、建筑安装分队、支援保障分队和警卫分队。他们将被部署到苏丹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市，作为落实“安南方案”第二阶段支援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承担任务区内修建及维护道路、桥梁、建筑物、停机坪和防御工事、勘察水源、钻井和修建相关取水辅助设施等工程保障任务，为联合国与非盟维和部队的混合行动创造条件。

四、中国的建设性作用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赏

2007年8月1日，苏丹外长阿库勒表示，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1769号决议，同意联合国和非盟派驻2.6万人的混合维和部队。中国政府为推动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1769号决议，做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努力，苏丹外长在声明中对中、俄等国的积极努力表示了感谢。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关键在于处理好了三个问题：一、尊重苏丹政府的主权，坚持不干涉苏丹国内事务，而以朋友身份发挥建设性作用。负责中国政府达尔富尔事务的刘贵今大使多次表示：“达尔富尔是苏丹的达尔富尔，是非洲的达尔富尔。”中国始终遵循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达尔富尔问题，从而赢得了苏丹政府的充分信任；二、坚持平等相待，以平等的身份、友好的态度同苏丹政府进行对话和协商而非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动辄以制裁来威胁，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在中方支持下安理会通过的1769号决议不仅为联合国—非盟部署混合维和部队铺平了道路，并且回避了对苏丹施加压力或经济制裁的内容。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哈利姆认为决议照顾到了苏丹政府的许

多关切。正如刘贵今大使所说：“中方努力说服西方同行采取强硬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实施经济制裁只会阻碍苏丹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合作态度，并使形势更加复杂。”^[10]三、坚持以长远的眼光，从大局出发来解决问题。中方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困，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了，这一冲突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中国政府积极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多次向苏丹提供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的投资使苏丹形成了一整套炼油、石化工厂和贸易体系，10多万苏丹人在中苏合作项目中找到了工作。中国帮助苏丹建造的麦罗维水电站大坝将于2008年竣工，届时它将使苏丹全国发电量增至原来的三倍，不仅可以缓解苏丹电力短缺，还可为方圆约100公里内的土地提供灌溉水源。

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积极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本·哈拉2007年4月17日在会见中国驻阿盟全权代表吴思科大使时表示，阿盟高度赞赏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的立场是公正、积极和平衡的，所发挥的作用是建设性的和有独特影响力的，并愿与中方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解决做出不懈努力。^[11]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盖埃诺2007年9月10日在布鲁塞尔表示，在联合国安理会寻求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共识方面，中国起着“非常重要和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盖埃诺表示，相信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中国可以利用其与苏丹政府的良好关系，促使各方更加关注苏丹和非洲的利益，找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途径。^[12]

2007年9月，即使主张把达尔富尔问题与“抵制北京奥运会”相挂钩的美国也承认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9月19日，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纳齐奥斯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在幕后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中国利用自身对苏丹政府的影响力，促使苏丹政府接受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769号决议，促使苏丹政府答应参加即将举行的和平谈判。此外，中国将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315名维和工兵。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还作出了其他承诺，这是非常有建设性作用的。”^[1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贝德也声称，不应让中国为达尔富尔问题负责，中国过去一年中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取得积极成果，“任何政府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也将造成严重的错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团体“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发言人艾伦·布鲁克斯·拉舒尔也对美国媒体发表谈话，指出联合国第1769号决议的通过，反映了中国在通过政治渠道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承担了国际责任，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13]上述三人分别来自美国官方、学界和非政府组织，中国能够赢得他们的一致赞誉实属不易，表明中国在推动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解决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已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肯定。

五、达尔富尔问题推动中国非洲外交转型

达尔富尔危机既考验了中国的非洲外交，也表明中国非洲外交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苏丹内政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放弃推动和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外交努力。中国政府在坚持外交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突破原有机制，通过派遣特使、外交斡旋、派驻维和部队等途径积极参与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承担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

任”。

中非关系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20 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非领导人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开始接触，1956 年起中国与埃及等非洲国家陆续建交，至 1979 年底，中国已与 44 个非洲国家建交。在这一阶段，中国和非洲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盟友共同团结起来，开展反殖、反帝和反霸斗争。由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的中非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20 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中国对非外交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中非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开始淡化，务实的经济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导因素。中国和非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进入了为经济独立而奋斗的新阶段，而中国也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非关系变得更加讲求实效，更加注重经济合作与平等互惠。中非经贸飞速增长，从九十年代的 10 多亿美元发展到 1999 年的 64.8 亿美元；^{[14]503} 进入新世纪后，中非关系加速发展并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对非外交开始了战略性的调整，平等的战略性“互利共赢”成为中非关系的主轴。2006 年初，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公开表示要“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经贸合作更是发展迅速，2000 年中非贸易额首次超过 100 亿美元，2006 年双边贸易额已达 554.64 亿美元。2007 年 1~6 月，中国与非洲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就已达 32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从经贸往来、人员互访到建立长效机制和对话论坛；从单一的政治对话到派驻特使和维和部队、积极参与解决地区危机，这都表明快速发展中的中非关系正经历一个全新的转型过程。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现实是中非关系发展的大背景，那么中非双方日益增长的战略需求则是双方关系加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非洲国家基本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但很多国家仍未摆脱贫困，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不少非洲国家既期望能搭乘中国经济快车，摆脱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提升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同时也期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由于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日渐显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也日益突出，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度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对非外交呈现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强调发展同非洲国家在互惠合作基础上的新型战略平等伙伴关系，也更为重视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非洲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贺文萍.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作用[J]. 西亚非洲, 2007(11).
- [2] 达尔富尔问题的人道主义援助[EB/OL]. [2008-01-19]. <http://www.un.org/chinese/ha/issue/sudan/index.shtml>.
- [3] Jonathan Steele. Unseen by Western Hysteria, Darfur Edges Closer to Peace[N]. The Guardian, 2007-08-10.
- [4] 熊争艳. 谁在鼓吹“抵制奥运”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N]. 国际先驱导报, 2007-04-17.
- [5] David J. Scheffer. China and Darfur: Time for Pressure[N]. New York Times, 2007-04-16.
- [6] Peter Brookes. Empowering Evil: China Aids Sudan's Killers[N]. The New York Post, 2007-04-10.

- [7] 马海兵, 李志强. 中国带给我们石油与和平[N]. 光明日报, 2007-02-02.
- [8] 邵杰, 钱彤. 胡锦涛主席考察苏丹喀土穆炼油有限公司:加强互利合作, 促进自主发展[N]. 光明日报, 2007-02-04.
- [9] 温宪. 达尔富尔:中国着眼全局[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02-07.
- [10] 刘东凯,林立平. 中非共同语言使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EB/OL]. [2007-10-04].
<http://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chn/zxxw/t369384.htm>.
- [11] 阿盟副秘书长高度赞赏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EB/OL]. [2007-04-18].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wjg/zwbd/zybd/t312344.htm>.
- [12] 谢栋风. 联合国高官赞扬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用[EB/OL]. [2007-09-11].
<http://gb.cri.cn/14558/2007/09/11/1745@1756016.htm>.
- [13]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作用获赞誉[EB/OL]. [2007-09-27].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7-09/27/content_6801372.htm.
- [1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2001[M].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1.

China's Diplomatic Endeavor in Sudan's Darfur Crisis

YU Jianhua WANG Zhen

Abstract Darfur crisis is a racial conflict caused by natural resource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Sudan tribes. China shouldn't be complained about the crisi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shirks their responsibility on the issue. China's constructive role on Darfur issue has been praised widely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 Not only is Darfur crisis a big challenge to China's policy towards African countries, but also it pushes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African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Darfur Issue; China-Sudan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责任编辑: 马丽蓉)